

何满子著

论儒林外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07.41/20

论儒林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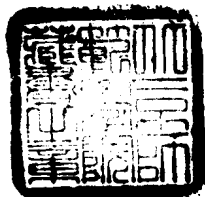
何满子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827764



封面设计：严渝仲

论儒林外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70,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3 $\frac{1}{2}$ 插页 2

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500

书号 10019·3211

定价 0.33 元

目 次

论《儒林外史》

- 一 吴敬梓的道路····· 1
- 二 为人民的作家····· 8
- 三 生活和艺术····· 17
- 四 风格即人····· 26
- 五 吴敬梓的理想人格····· 33
- 六 照妖镜下的封建社会····· 43
- 七 吴敬梓的天才的性质····· 51
- 八 “创作总根于爱”····· 56
- 九 表现方法的特征····· 67
- 十 《儒林外史》的结构····· 74
- 十一 从楔子窥全豹····· 85
- 十二 《儒林外史》的价值和影响····· 92

关于《儒林外史》的两封信····· 96

后记····· 107

一 吴敬梓的道路

兰台家世千秋重，
艺苑文章四海传。

——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1701—1754）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活动为“主文”的、诗人对他的时代生活的判决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

……智力活动微弱的人……做了诗人或艺术家的时候，他的作品除了再现出生活中他所最喜爱的几方面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可是，如果一个人的智力活动被那些由于观察生活而产生的问题所强烈地激发，而他又赋有艺术才能的话，他的作品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一种企图，想要对他感到兴趣的现象作出生动的判断……。①

吴敬梓正是被生活中的问题激发起了强烈的智力活动，而又恰巧赋有艺术才能的一个人。他的《儒林外史》，也正是以高度的艺术才能，再现了和批判了那激发着他强烈的智力活动的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质言之，现实主义的作品。《儒林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页102。

外史》卷首有一篇闲斋老人的序^①，其中有两句话，对这小说的性质作了简约的然而极切要的提示：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

所谓“迥异玄虚荒渺之谈”，就是说，吴敬梓的作品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是被生活中的问题激发出来的。所谓“外史”，顾名思义，是补正史之所不书，也就是闲斋老人这一序文中所说的“史之支流”的意思。但因为作家是被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所激发，艺术地描叙了那蕴含着问题的生活之真实，又且带着深刻的思想对所表现的历史内容作了公正而尖锐的评

① 这篇序写明作于乾隆元年（1736）春二月，这年月是不可靠的。因为这序的口气，是写于《儒林外史》已经完稿之后；而事实上，同年三月，吴敬梓还在被征赴博学鸿词的省试；那末，以杜少卿自况的吴敬梓决无预知他将被征和辞避的事情。有论者说这是作者于小说作成后托名的自序，但未具确证。按事理论之，托名而又托一个年月，实在费解。而且这序文笔调，也大不类吴敬梓的文字。1874年刊行的齐省堂本，在这序前冠有“原序”字样，我因而曾疑心这篇序是第一个刻印《儒林外史》的金兆燕托名写的（据金和跋文中说：“外史”“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金兆燕于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任扬州府教授。），我认为因他深知吴敬梓，而一个府学教授的地位，也不便宣扬同时代人作的“稗史”，因此化名作序。是以后来的刊本题作“原序”。但后见1803年的卧闲草堂刻本，这序前并无“原序”字样。这样，既未见金兆燕的初刻本，又不知齐省堂本的祖本是初刻本呢，或只是以卧闲草堂本为据，这序文的作者就只好存疑了。又有论者认为闲斋老人可能就是卧闲草堂主人，并且根本怀疑是否存在过金兆燕的初刻本，说卧闲草堂本可能是这书的创版。如果说闲斋老人可能就是卧闲草堂主人，这从两个名字同一“闲”字的巧合上，还有可信之处；但如果竟连卧闲草堂本以前曾有金兆燕的初刻本这一点也怀疑起来，却难以置信。金刻本应肯定它是有的。其一，有金和的记述；其二，和吴敬梓同时代的程晋芳既说“竟以稗说传”，足见“外史”是已经刊印传世，而不仅是手稿的了。

衡，那末，他虽不将作品“自居于正史之列”，却要比那些罗列现象甚至歪曲真实的正史更予人以多方面的教益。也即是说，由于这种“活生生的判断”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逼真的不加粉饰的描画上的，所以便更具体而动人。从而，那作家和作品便愈加为害怕揭露真实的社会上层人物所痛心疾首。因此，对于吴敬梓这样一个人和《儒林外史》这样的作品，即连并非伪造学或腐儒的、而且知他甚深的程晋芳，也尚且作了这样赞赏中含有轻蔑味的惋叹：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①

那末，这部所谓稗说之遭到旧时代庸俗的知识分子群——即所谓“儒林”——的冷淡和轻视，以及这个怀有超越凡流的心胸的作者之“终受欺于拙目”^②，就更不足为奇了。

这个卓越的作家在生前备受世俗的讪笑诋毁，他的杰出的创作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受到了极其冷淡的待遇。虽然据金和在跋文中所记，金兆燕在任扬州府教授时（1768—1779）就把它刊印了，但就这一初刻本今日不获觅见这一点来判断，可知流布是不广的。现存的最早版本卧闲草堂本的刊行，距作者之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1803年）。这说明，这部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和批判了时代生活的作品，如何地受到了构成

① 程晋芳：《春帆集·怀人诗》十八首之一中句。

② 《文木山房集·移家赋》中句。赋中述及自己“乃众庶之不誉”的情况，有“……眷念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谁为倒屣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等句。当时受人白眼之况，殆难堪已极。又集中刊庚戌除夕客中作《减字木兰花》八阙，其三有云：“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可见吴敬梓所受的社会舆论的非薄，有常人之所不能受者。

旧日读书界的士大夫的嫉恨和排斥。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作品诞生以迄“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一长时期内很少有人评述它这一事实，看出这样的消息：这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是如此地真实，它的抨击是如此有力，以至被它的讽刺所激怒了了的儒林君子，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在难以反驳的真实之前缄口无言。他们只有采取冷淡的方法来抵制。《儒林外史》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即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这些划时代的历史事变，清朝封建统治机体已经从内部腐烂到表皮，为吴敬梓所猛烈攻击的科举制度也无法再维持下去的时候，才有了较多的刊本，得到了较广的传布。但比起《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较它晚出的《红楼梦》来，还是差得远。当然，流行的程度和作品的价值比较，更远远地不能相称。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常常深感到旧时代欠了优秀的古典作家们一笔很重的债。不仅在物质上，旧社会没有给古典作家出色的精神生产以报酬，使他们往往终生备受生活的煎熬；特别是在精神上，没有拿公道去对待他们的崇高而艰辛的劳动，他们呕心沥血的对人民的奉献。封建统治思想把小说看成“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道”，“君子弗为也”，“刍蕘狂夫之议”^①；斥为“诬漫失真，妖妄荧听”，“猥鄙荒诞，徒乱耳目”^②……因此，我们前代的天才们不能把文艺当作他们生活中的主要事业；在社会舆论的白眼下，只能悄悄地、象干着一件卑微的勾当那样地进行他们的创作；而专制的封建制度和庸俗的社会气氛又压低着诗人的想象活动。在这种条件下，

① 《汉书·艺文志》论小说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小说语。

只有那些能使自己伸根入雄伟的人民生活的深处，善于从生活中吸取刚强善美的滋养，从而锻炼得使自己具有伟大的心的勇力，敢于与世俗顽抗的高贵的心灵，才能冲破漫漫长夜的沉闷的空气，唱出清亮的战斗的声音来，宣示人民意志的终不屈服，显露那培育出瑰丽的艺术花朵来的人民的黑土的深厚的潜力。不用说，这种伟大艺术家本身也是他所处在的时代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他们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受着自己时代的制约，表现着认识上和艺术方法上的历史性的局限，但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艺术能力，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自己时代的人民生活，他们的作品便具有永不消失的魅力、独创性和美；他们也因自己的富于生命力的劳作而不朽，而引起后代人民无穷的感念。吴敬梓便是这种杰出的人物之一。

吴敬梓生长于累代科甲的闾阎世家，他的曾祖辈弟兄五人，有四个是进士；他曾祖吴国对且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①。他的祖辈也都显达，如吴昺是康熙三十年的榜眼，吴晟是进士；他的亲祖父死得很早，也做了州同知。他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丙寅年的拔贡，任江苏赣榆县教谕。生长于这样声势显赫的门第中，吴敬梓便厮混在宦宦、乡绅、膏粱子弟、科场中人、名士、清客堆里，看透了他们污浊的灵魂，识破了上层社会的种种丑相。宦宦吗，一簇颞顽昏聩、徇私舞弊的蠹贼；乡绅吗，一帮武断乡曲、趋炎附势的恶棍；膏粱子弟吗，一些不通庶务，仰仗父兄财

① 方燧：《文木山房集序》。

势，挥霍度日的昏虫；科场中人吗，一群鼠目寸光、利欲熏心的陋儒；名士吗，一伙附庸风雅的市侩和混江湖的吹牛匠；清客吗，一堆骗子。吴敬梓如果是一个平庸的、“精神活动微弱”的人，他可以充当上述的任何一种角色，在做社会的寄生虫的生涯中舒适地、浑浑噩噩地打发他的一生。但他不，庸俗、虚伪、卑劣和无聊的生活激怒了他，他辞谢了、鄙弃了命运带给他的这些“恩惠”，他选择了另一种行径，挺身与命运、与世俗搏斗。缙绅家庭培养出了一个缙绅阶级的叛徒。

吴敬梓接受了他的前辈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师的先进思想，特别是受了他们的逃避荐举，拒绝仕进，不与统治者妥协的高风亮节的感染。这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仰的坚毅的人，当他信服了某种思想，景慕了某种行为时，他便奉之为自己言行的规范，愈来愈坚决地要求自己贯彻到底，甚至坚决得达到了任性的地步。这样，他也就和循着统治秩序，唯功名利禄是求的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分歧，而且也和他自己的家人先辈走着不同的路，从而，他也就愈来愈和庸俗的社会舆论不相协调。发展到这样的情况，人便必须从下面两条路中选择其一：要吗屈服于庸俗的社会舆论，要吗和它决裂而迈向自己的目标，忘情于荣辱得失。吴敬梓，这勇敢的人毅然地选择了后者。他从事于生活中更崇高、更美好的境界的追求，他鄙弃了钻营和仕进之意，将祖产在资助贫困者的豪举中花尽，将庸奴们视为金饭碗的祖宗基业视作敝屣，远远地离开了那对他侧目嗤笑的家乡全椒，驾一叶扁舟，卜居于秦淮河上。连士大夫视为稀世之荣的博学鸿词的征辟，也托疾不赴^①；甘愿衣食不周，安贫乐道地度过他自己所歆羨的“嵒崎磊落”的一生，一如

他的理想人物王冕似的。他的不平凡的经历，他的高傲的品格，他的不愿和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超拔的精神，他的痛恨旧社会并毫不留情地揭露它的丑恶的倔强的战斗气魄，以及他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不朽巨作《儒林外史》里。

《儒林外史》所展示的社会生活面是极其广阔的，但它篇幅最多、刻画最着力的则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的辛辣尖刻的讽刺的矛头正对着“儒林”，即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代表。吴敬梓恰巧以他的“稗说”狠狠地打击了那些“稗说”的轻视者，那些卫道的“正人君子”。在今天看来，那惋叹其“竟以稗说传”的程晋芳，当他兴起有些瞧不起“稗说”的思想活动的一刹那，也正代表了“正人君子”的腐朽的观点，从而也就和那些鄙儒庸夫一道，成了他的不朽的友人“刻画工妍”的巨笔所鞭挞的对象了。

① 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说吴敬梓不应征辟是真的为了生病。他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推荐吴敬梓的江宁教授唐时琳在《文木山房集序言》中的说明。但是很显然的，如果吴敬梓装病而首先不瞒过他的举荐人，怎么还能瞒过别人呢？唐序中“两月后，敏轩病愈，至余斋，……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云云，自然同样可以作为唐时琳被他的装病所骗过了的解释。既然在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上向外界装了病，所以他在《丙辰除夕述怀》诗中，便也有了“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的句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托病的次年，吴敬梓就写了《酬青然兄》一诗；既然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酬青然兄》和《贫女行》两诗，分明是对应征了了他的堂兄的嘲笑，那末他自己的不愿赴试，就极为明显了。不错，他曾应学院和抚院之考，但那可能是推荐者的盛情难却，也可能是试期和荐期迫近，仓卒间不能突然装病之故。至于说《丙辰除夕述怀》诗中吐露了追悔未能赴试之意，也是极自然的；其一是要实生病之托词；其二是，“鸡肋虞人”、“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不能要求封建时代的吴敬梓完全没有。

二 为人民的作家

一事差堪喜，
侯门未曳裾。

——春兴之五

人们反抗现实，常常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选择那他们认为最厉害地阻碍着他们的出路、束缚着他们的自由发展的势力，作为攻击的目标；当他们的攻击比较深入时，就必然会提高到对一种社会制度的反抗，于是他们的斗争便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质。如果他们所反抗的对象正是窒息社会进步的制度和势力时，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就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成了人民的要求的体现者，从而他们的反抗行动也就成了进步的革命的行动了。

知识分子的吴敬梓，便从知识分子的切身感受出发，进而攻击那桎梏着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想的科举制度和八股习尚；他明确地认识到他所攻击的对象，乃是妨碍知识分子和社会正常发展的根本性质的祸害。

具有制艺文章的家学渊源，且“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①的吴敬梓，要从八股文骗取功名，决不是难事，否则就不会来征辟他了；但他鄙视这种奴性的

“举业”，鄙视除了经书章句和墨卷以外一无所知的昏庸的干禄之徒。因此他“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②。

痛恨科举制度，瞧不起八股文和那些自以为“代圣贤立言”的八股专家的，明、清两朝的卓识之士中颇不乏人。例如顾炎武，就是攻击八股取士制度最力的一人。他在《日知录》里说八股教育是“国之盛衰，时之治乱”的祸根；并且痛切地说：“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③ 吴敬梓受了这离他未久的先贤的思想影响，更由于悲痛的现实的亲历目击，使他对科举制度怀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在《儒林外史》楔子中，他也和顾炎武一样，借王冕的嘴批评八股科举制度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认为实行这种弊害无穷的科举制度，是“一代文人有厄”。不但文人有厄，而且使全社会蒙受毒害，各阶层的人们都给这制度塑捏得阴阳怪气，一如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揭示的。他既认识和痛恨这种制度的危害性，因此便毕生以全力和它进行斗争。

有清一代统治知识分子的方法虽有多种，例如：初期的大兴文字狱的屠杀政策，康乾两朝的删改古书以及设博学鸿词科笼络名儒等等；但最基本的手段还是变本加厉地袭用明代的科举制度来训练知识分子做驯服的统治工具。只要这一制

① 程晋芳：《吴敬梓传》。

② 同注①。

③ 《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条。

度行之有效，思想上的禁锢便基本上达到了。任何意识领域中的斗争要是不损害这一全面网罗知识分子的制度，就不能在思想战线上动摇清皇朝的统治。纵或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上的某些部门有所进展，但这些进展在这一奴役制度的前提下，也只是奴隶甚至奴才的带着枷锁的跳舞：这跳舞也许真是精致的、有用的艺术，可是却不能直接改变人民的被奴役的命运。

鲁迅在杂文《算帐》里写道：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失去全国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①

当然，鲁迅并没有叫人要轻视清代学者治学的功绩的意思；他只是从历史的教训，揭露那些“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的洋翰林胡适之流的真面目。胡适之流当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统治下，拚命叫人不问政治，不关心社会，埋头到研究室去治学，仿佛只要少数学者有了成就，社会政治便会得救的一样。为了使这种荒谬的说法言之成理，“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流便努力强调“康熙大师”和“乾嘉大师”的作用，似乎他们的存在，便已经使清朝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无能为力，

① 《鲁迅全集》（鲁迅纪念委员会本，后同）第五卷页571。

已经使统治集团恃为思想统治的主力的八股毒焰变成了不能伤人的“死老虎”，也似乎那些清代的文人如王士禛、袁枚，朴学大师如戴震、阮元等人，倒不是从八股文应试出头，或者他们能出污泥而不染，一点不沾八股气的一样。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便这样说：

有人说：“清朝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八股的势力并不很大，……何以吴敬梓单描写那学者本来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岂不是俗话说的打死老虎吗？”……看我这篇“年谱”的人，可以看出吴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清朝第一个时期的大师，毛奇龄最后死。……文学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禛也死了。当吴敬梓三十岁时，戴震只有八岁，袁枚只有十五岁，……当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起来了。……这正是吴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时代。懂得这一层，我们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了。（重点系原文自有——引用者）

这种论调的可笑之处有：第一，代表昌明的古学而致八股老虎于死地的康熙大师刚一死，“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起来了”，妙哉！那末这些大师们以及他们的古学的力量也就实在太脆薄得可怜了；相形之下，八股倒并不是死老虎，而那些大师和古学却是纸老虎了。第二，《儒林外史》既因出现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才有真正的价值，那末，到了乾嘉大师一起，古学重又昌明起来之后，应运而生的《儒林外史》岂不是又要随八股之忽然又变成死老虎便应运而灭了吗？

这真是道地的实验主义——主观观念论者的谬说。自己钻在研究室里，膜拜在几个清代大师的衣裾之下，便以为他们

就是当时社会精神生活的全部，或者以为这少数浮出在社会文化顶端的学者的思想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的统治性的现象；于是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将作为统治全社会的八股的毒焰看得无足轻重一如死老虎；好象“学者们本来都瞧不起”，八股势力便会从客观存在消失的一样。不用说，追随着这种论调去考察《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只会得到荒谬的结论；从而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只有使人“格外”不“明白”，只有抑低。

事实上呢，谁也知道，不管古学多么昌明，学者们如何瞧不起八股，可是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有清一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把做八股文考取功名当做唯一的出路的；《儒林外史》所刻画的周进、范进们，甚至到科举制度废除后也还是活生生的存在。不但如此，连绝大多数瞧不起八股的朴学大师们，自己也是不免借八股文作敲门砖而取得了荣宗耀祖的功名利禄的。即使他们在丢了敲门砖以后治了古学，但几个凤毛麟角的朴学大师，在茫茫八股秀才的人海中，也不过有如蕞尔小岛，决不能改变大海之为大海，狂澜之为狂澜。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运动的发轫，原是由于宋明理学、特别是晚明“狂禅”一派的反动，开其先河的大师顾炎武，其治学方针，照梁启超的看法，有三大特点，即第一“贵创”，第二“博证”和第三“致用”^①。为了贯彻这三点要求，特别是要达到“贵创”和“致用”，就必然要反对那束缚创造性的科举取士制度，那和经世之务了不相干的八股制艺；顾炎武、黄宗羲等宗师所以便正是科举

①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第四节。

制度和八股文的坚决反对者。但康乾以降，继起的朴学家们只片面地发展了他们的前辈的“博证”这一端，便成了单纯地做考据功夫了。自然，考据要比游谈无根切实得多，但考据一旦成为治学的唯一方法，甚至降而形成“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以后，也就和“贵创”与“致用”各不相谋，丧失了思想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价值了。如果说，朴学大师们所反对的明代的学风是理学与帖括携手，那末，他们所造成的局面也不过是以琐屑的考据代替了空疏的理学^①，使考据与帖括联盟而已。古学既不和科举制度相悖逆，不能损及清朝精神统治的基础，便无法动摇社会风尚的根柢；而千千万万的八股秀才事实上也不会因为朴学的存在甚至繁荣而放弃做八股文，而减少他们的冬烘气。即使古学家嬗递不息，古学并不中衰，不出现所谓“青黄不接”的时代，吴敬梓所讽刺的社会现象，所打击的社会势力也是铁一样地存在的，而且是作为精神领域中的最根本的痼疾存在的。这一现实存在，朴学的盛衰便无以增损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和他的杰作《儒林外史》的价值。

是的，吴敬梓晚年也治过经学，著有现已失传的《诗说》七

^① 但也应该公平地说，乾嘉考据家中，也偶见反抗现实的斗争性的论说的。例如朴学大师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便是很杰出的例子。书中提出了反对礼教束缚，主张个性解放的激烈的议论。可是戴震的考据学虽风靡一时，但这种比较有斗争性的理论，当时的朴学家却大都采取排抑的态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所记：“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珪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珪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朴学家是不敢和反动统治思想交锋的，于是只有在八股制度下讨生活，钻入不会触犯反动统治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小天地。